

世界為何在仇恨中燃燒：探討種族衝突的政治、經濟與心理因素

余創豪

美國思科系統公司

摘要 耶魯大學法律學教授蔡美眉 (Amy Chua) 在《燃燒的世界：自由市場民主的輸出滋養了種族仇視和全球動蕩》一書中，指出全球一體化在世界各地造成了許多問題，例如資源分佈不平均、種族衝突。一方面，經濟自由化令一個國家裏面的一小部分人受益，但另一方面，沒有在經濟上得到重大利益、卻對得益者充滿妒忌心的大多數人，卻通過政治民主化而得到權力，於是乎後者對前者壓迫。本文將會介紹和分析蔡美眉的觀點、與及一些美國右派和左派學者的回應，本文亦會以東北大學“暴力與衝突研究中心”研究員李雲 (Jack Levin) 與拿賓露域 (Gordana Rarenovic) 之心理學論點，對蔡美眉的政治學、經濟學分析作出補充。

美籍華裔耶魯大學法律學教授蔡美眉 (Amy Chua) 的名著《燃燒的世界：自由市場民主的輸出滋養了種族仇視和全球動蕩》在2003年出版之後，¹ 引起海內外學術界和一般大眾的熱烈討論。這本書的主題是：美國主導的全球一體化（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在世界各地造成了許多問題，例如資源分佈不平均、種族衝突，這是全球反美情緒高漲的原因之一。一方面，經濟自由化令一個國家裏面的一小部分人受益，蔡美眉稱之為“主導市場的少數民族” (Market-dominant minorities)，但另一方面，沒有在經濟上得到重大利益、卻對得益者充滿妒忌心的大多數



人，卻通過政治民主化而得到權力，於是乎後者對前者壓迫。² 本文將會簡單地介紹和分析蔡美眉教授的觀點、與及一些美國右派和左派學者的回應，最後，本文會以東北大學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暴力與衝突研究中心” 研究員李雲 (Jack Levin) 與拿賓露域 (Gordana Rarenovic) 之心理學論點，對蔡美眉的政治學、經濟學分析作出補充。

一 燃燒的世界

年少時，蔡美眉是菲律賓華僑，她親身經歷了菲律賓人的反華態度，她富有的姑媽被菲律賓匪徒謀殺，警方在檔案上寫謀殺動機是：“報復。” 在菲律賓人眼中，華人自他們身上剝奪了原本是屬於菲律賓人的財富，故此，殺死華人無非是“報復”。當地許多華人成爲綁架的對象，警方卻愛理不理，一名警員甚至說：“華人有能力付贖金。” 蔡美眉由菲律賓的“主導市場的少數民族”爲始點，進而討論整個東南亞華人的經濟成就，招來當地人的嫉妒、排擠。華人只是佔了越南人口的百分之三，他們卻控制了一半市場經濟活動；在印尼，華人數量亦只有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三，可是，印尼七成經濟卻被華人控制。爲此之故，無數華人在歷年暴亂中喪生。³

蔡美眉在全球各地觀察到類似情況，在拉丁美洲，白種人在經濟領域中遠比有色人種成功；在共產制度解體之後，猶太人控制了俄羅斯的經濟命脈，普京總統上台之後，其打擊猶太“奸商”的政策大受歡迎；在非洲，除了南非白人之外，還有三個族裔在經濟上獨佔鰲頭，一個是印度裔，一個是黎巴嫩裔，一個是



奈及利亞的伊布人 (Ibo of Nigeria)，不消說，他們都成為窮人搶掠的對象。⁴

蔡美眉將全球性衝突、地區性衝突、和以上那些國內社會問題，放在同一脈絡下分析，她認為：在中東地區，相對於阿拉伯國家，以色列是“主導地區的少數民族”，⁵ 相對於全世界來說，美國是“主導全球的少數民族”。⁶ 這些少數民族擁有不成比例的財富和影響力，無怪乎成為憎恨的目標。

蔡美眉指出：美國主導的全球一體化，更加深化了這些仇恨，她並不反對全球化，也認同民主政治、市場經濟等美國價值，可是，她反對盲目相信公職選舉、開放市場就可以解決第三世界的問題。第一，在民主政制下，一直對有錢人不滿的窮人，突然間得到政治力量，於是乎造成了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的悲劇，盧旺達、印尼、南斯拉夫的種族衝突，是在此背景下產生；假若沙特阿拉伯現在實行民主政治，恐怕拉丹等極端主義者會得到大量草根階層的選票。第二，西方社會通過漫長的社會實驗，才逐漸建立起一個社會安全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而失敗的人，或者是遭遇不幸者，都可以得到基本照顧，可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缺乏社會安全網，一下子完全開放市場、任人自由競爭，結果造成貧富懸殊，而往往不均勻的財富分佈是隨著種族分界，於是乎整個世界在種族仇恨中燃燒起來。

蔡美眉提出許多補救方案：美國應該放緩推動全球一體化、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步伐；經濟上的弱勢社群，應該檢討自己失敗、他人成功的原因，例如前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斯曾經鼓勵馬來人學習華人的勤勞和商業智慧。另一方面，主導市場的少數民族應該要盡量避免令人反感的行為，例如財大氣粗的態度，而且要將所得利益回饋社會。⁷



二 右派與左派之回應

蔡美眉的著作之所以受到廣泛注意，有其歷史背景之因素。在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際，議會政治、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彷彿已成定論，霍金斯大學美籍日裔政治學教授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甚至宣稱至此人類之歷史已達到終點 (End of history)，⁸ 在後冷戰時代，美國制定的對外政策，是推動美式民主體制、法治精神、和自由貿易，這政策名之為“華盛頓共識” (Washington Consensus)。⁹ 過去十多年，隨著通訊科技（特別是互聯網）、國際貿易迅速發展，美國企業和傳播媒介都認為全球一體化將會帶來人類社會的整體進步，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紐約時報記者費民 (Thomas Friedman)，就是鼓吹全球化正面效應的健將之一，¹⁰ 然而，過去幾年這種樂觀態度卻受到嚴峻挑戰，“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戰爭”之後，人們意識到反美情緒已經和西式民主制度、自由經濟連在一起，人類之遠象不再是美國人想像中那麼一片光明，小布殊政府以武力在伊拉克硬銷民主，更加令溫和的自由主義者感到寒心。十多年前，蘇聯東歐的崩潰令左派學者墮入思想真空，那麼，現在蔡美眉的著作，正是無情地揭露了右派意識形態的危機。¹¹

有趣的是，美國右派或左派學者都不歡迎蔡美眉的觀點，美國企業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的研究員穆拉維奇 (Joshua Muravchik) 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批評蔡美眉為“新悲觀主義者”，說蔡美眉是新悲觀主義者，那麼當然有舊悲觀主義者，穆拉維奇指出：在列根鷹派政府時代，不少人認為美國花費太多軍費跟蘇聯抗衡，此舉會令美國經濟不斷走下坡；在日本之經濟如日中天時，人們亦預測日本將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然而，過去種種悲觀主義的危言聳聽都落空了，穆拉維奇承認現今全球反美情緒高漲，可是，他認為美國不應該因此



就走向孤立主義，倘若在1980年代美國人接受悲觀主義者的美國沒落論，西方世界便不可能在冷戰中取得勝利。¹²

紐約大學教授甘甸 (Greg Grandin) 是新左派學人之代表者，他認為蔡美眉的見解，暴露出新自由主義者 (Neoliberal) 的思想貧乏。蔡美眉認同民主制度、資本主義等美國價值，問題在於美國急促地向外輸出這些價值，而沒有充分理解那些國家與西方社會截然不同的特殊背景。甘甸卻指出：在冷戰時代美國為了爭取對抗蘇聯的盟友，不惜支持反共的獨裁者，促進民主根本不是美國對外政策的首要目的，甘甸認為蔡美眉忽略了資本主義制度和暴力傾向的深層關係，她對美式資本主義提議的溫和改革，根本於事無補，相反只會將打著民主政治、自由經濟幌子的“新帝國主義”合理化；還有，蔡美眉將焦點對準種族衝突，其實，這種衝突之後面，是經濟原因的階級鬥爭，因此，他認為應該將這些問題放在新左思潮的架構下分析。¹³

以上的右派與左派學者，都從意識形態的眼鏡看蔡美眉的言論，穆拉維奇幾乎完全否定蔡美眉提出的問題，堅持美國繼續原來的自由主義路線、鷹派對外政策；甘甸亦否定蔡美眉的分析，主張重返批判資本主義、擁抱馬克思主義的道路。¹⁴ 這種類似冷戰時代的對立，予人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

三 種族差距看為表面病徵

筆者瀏覽過不少批評蔡美眉的言論，發覺大多數學者都不願意正視蔡美眉提出的問題。這情況跟1994年“鐘型曲線” (Bell Curve) 的爭論十分相似，當時理學家何利丹 (Richard Herrnstein) 和政治學家馬里 (Charles Murray) 合著了一本頗具爭議性的書，名為《鐘型曲線：美國生活的智慧和階級結構》，在這本書裏



面，何利丹與馬里指出：許多智商測驗的結果顯示：猶太人、東亞人的智商最高，其次為白人，表現最差的是黑人、西班牙裔人，他們嘗試探討這種族差距之遺傳基因的基礎。¹⁵ 此書一出，受到無數人尖銳的批評，何利丹、馬里被視為種族主義者，許多人甚至否定這問題真實存在，例如說智商測驗不準確、種族類別難以界定……。1996年我參加了美國教育研究協會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的週年學術會議，在大會上德拉威州立大學 (University of Delaware) 高化臣 (Linda Gottfredson) 教授為何利丹和馬里辯護，她說：“種族之間的表現差距確實存在，如果我們現在不正視這問題，將來下幾代會付出更加沉重的代價，去面對更大的問題。”高化臣曾經在自己大學進行類似鐘型曲線的研究，可是大學當局禁止她繼續下去，因為關於種族的題目太敏感。¹⁶

十年前，何利丹和馬里提出了美國國內種族之間的表現差距問題，十年後，蔡美眉提出了全球性的種族差距問題，有趣的是，許多人根本不承認這些問題的確存在，對許多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的學者來說，何利丹、馬里提出的國內種族表現差距，是種族歧視和不公義社會制度的結果，由一九六〇年代詹森總統提出“大社會運動”、“向貧窮宣戰”、馬丁路德金牧師推行黑人民權運動至今，很多企圖改善種族差距的制度改革已通過漫長而大規模的實踐，平權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 甚至令少數民族比白人享有更多機會，可是，到了2002年，美國裏面種族表現差異比起四十年前卻有增無減，例如美國白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數，比西裔家庭高十一倍，比黑人家庭高十四倍；¹⁷ 有趣的是，白人學者德沃金 (Ronald Dworkin) 繼續支持平權法案，¹⁸ 反而美籍印度裔學者蘇沙 (Dinesh S'Souza) 卻認為：以制度方法 (institutionalizing) 對付種族問題，是緣木求魚。¹⁹



同樣，對許多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律學的學者而言，蔡美眉提出全球性的種族經濟差距和利益衝突，亦無非是表面病徵，深層原因是美國的對外政策、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資本主義制度的弱點，然而，若參考美國之經驗，那麼縱使有一個全球性的平權法案、或者是在西式民主、市場經濟之外提出另類選擇，種族仇恨又能否得到徹底解決之道呢？遺憾的是，蔡美眉只是花了兩頁半紙討論出現“主導市場的少數民族”的文化因素，對蔡美眉和其他論者來說，種族衝突是政策、制度缺陷的結果，她們都沒有考慮這因果關係有沒有可能倒轉過來——種族偏見、排他態度令政策、制度失敗。種族問題，一直是美國學術界不成文的禁區，批評某個族群的某些文化妨礙經濟發展，是“政治不正確”(Politically incorrect)的言論，而批評不公義的制度、沙文主義、霸權主義、帝國主義卻比較容易得到學術界、傳播媒介接受，在這氣氛下，批評和支持蔡美眉的觀點都局限在有形無形的框子裏面。在以下部分，筆者會將焦點由全球化、美國的對外政策，轉移到美國國內種族差距的問題，進而延伸到世界性種族仇恨的問題。

四 爲什麼我們會憎恨？

東北大學之“暴力與衝突研究中心”研究員李雲與拿賓露域，合寫了一本題目爲《爲什麼我們會憎恨？》的書²⁰，無獨有偶，這本書也是探討爲什麼這個世界在仇恨中燃燒，不過，這是一本獨立而自成一體的書籍，而不是對蔡美眉的回應。論知名度，李雲與拿賓露域都不及蔡美眉，但筆者認爲：蔡美眉將全球性的種族衝突歸結成一、兩個因素，這未免將問題簡單化；反



之，李雲與拿賓露域提供了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文化學、歷史學等多個分析角度。我無法在這篇短文裏面介紹他們所有觀點，以下我將會探討歷史學和心理學兩個層面。

李雲與拿賓露域回顧了歐美社會種族衝突的歷史。自立國以來，美國一直是移民國家，1840年代，大量愛爾蘭和德國的農民來到美國，這移民潮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期，由188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義大利人和東歐猶太人進入美國，亦有不少移民自希臘、羅馬尼亞、斯拉夫、巴爾幹遷徙至美國。在1893年至1907年經濟衰退期間，這些歐洲移民都受到本土美國人歧視，後來美國人甚至將種族歧視延伸到中國勞工身上。1920年代，美國又經歷經濟衰退，排外意識再次擡頭，優生學支持者認為來自波蘭、俄羅斯、希臘、土耳其、意大利的“劣質”移民，將會降低整體美國人的質素，於是乎，政府通過了1924年的移民配額方案。1930年代的經濟衰退更是空前，在這期間美國出現了一百一十四個反猶太人的組織。1960年代是黑人民權運動的高峰期，當時許多猶太人的商店都受到黑人搶掠和破壞。1980年代，日本企業重創美國汽車工業，美國家庭電器工業更是全軍覆沒，因此反日情緒高漲，一名華裔工程師被兩名失業汽車工人誤會是日本人，結果被他們打死。1990年代，紐約市和洛杉磯的韓國人、越南人店鋪，都是黑人和西裔人搶掠的對象。1990年代，德國發生了無數次白人攻擊土耳其、非洲、越南移民的事件；²¹ 在英國，過去兩年發生了二千次襲擊移民的案件；類似事件亦發生在挪威、瑞典等北歐國家。

蔡美眉舉出的種族衝突例子，是出自菲律賓、印尼、中南美洲、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和區域，於是乎，過於急促的全球一體化、美國對第三世界的單邊要求、當地政治文化不成熟、經濟制度不健全……等等，彷彿順理成章地與種族衝突連在一起。可



是，李雲與拿賓露域的例子，卻來自政治、經濟都比較成熟的歐美國家。族群衝突，看來是一個跨越時空的普遍問題。

杜比 (Tupy) 在一篇針對《燃燒的世界》之書評中指出：西班牙在1492年頒佈排猶法令 (Expulsion Act)，當時西班牙統治者是專制王朝，而不是全球化促成的民主政體，排猶法令之目的，是維持天主教信仰的純粹性，而不是經濟原因。1881年和1905年俄羅斯推行反猶太人運動，那時俄羅斯是前資本主義社會。1969年馬來西亞發生排華，其時馬來西亞的民主化、自由化不及今天。²²

蔡美眉將美國歸類為“主導全球的少數民族”，如是者，反美情緒也可說是一個種族衝突問題。蔡美眉認為這是美國向外硬銷全球化的惡果，但有趣的是，反美情緒亦見於二次大戰之前。二戰之前，美國政府和人民都相信孤立主義，1921年哈定總統 (Harding) 在就職演說中強調美國絕對不會插手歐洲事務，亦不會對世界開放市場。²³ 報業大王赫氏 (William Hearst) 也極力鼓吹不干預主義。²⁴ 儘管如此，荷蘭學者加發 (de Graaff) 指出：當時許多歐洲人仍然充滿反美意識，他們認為“美國化”是對歐洲文化的威脅，在第一次大戰之後，美國充滿活力和樂觀精神，相反，歐洲卻老態龍鐘和充滿悲觀情緒，因此，歐洲人不喜歡日漸冒昇、有可能取代歐洲地位的美國。²⁵

當然，指出種族衝突無處不在和有著不同因素，這並不能否定當今種族衝突與全球化的關係。打個比方說，所有人都會死，有人凍死、有人病死、有人戰死，但這並不能推論在某次大饑荒中死亡與缺少食物沒有關係。所以，筆者絕無意思淡化美國對外政策的缺陷、全球化的隱藏危機、第三世界政治文化不成熟、經濟制度不健全等問題，換言之，在某程度上我同意蔡美眉提出的補救方案，但另一方面，種族衝突並不能看為一個表面病徵，以



為只要放緩全球化、甚至美國重返孤立主義，種族衝突就可以得到解決。

其實，即使沒有全球化，發展中國家仍然保留著君主政體、前資本主義經濟，種族仇恨並不會減輕；反過來說，即使一個社會裏面政治經濟制度成熟，種族衝突仍會發生；而且，縱使美國好像二次大戰前般閉關自守，只要美國仍然是世界首強，反美情緒絕不會銷聲匿跡；若美國沒落，那麼另一強國也會成為衆矢之的。種族衝突是衆多類型族群衝突之其中一種，人類可以為了宗教、意識形態和各種分界線而拚個你死我活。

李雲與拿賓露域指出：因著遺傳基因，人類傾向於喜歡與自己相似的群體、不喜歡和自己不同的人。即使人類身處一個完全同質的群體，我們必定會找一些分別出來，如果種族和宗教都沒有分別，人類會“發明”某些分界線，例如誰是聰明？誰是愚蠢？誰最有道德？誰沒有道德？李雲與拿賓露域舉出一個極端荒謬的例子：有人以擲硬幣的方法分組，得出“公”者歸入甲組，“字”者歸入乙組，分組之後，兩組的成員就會堅定不移地相信自己一組比另外一組優越。²⁶

1961年，沙聶夫婦 (Muzafer Sherif and Carolyn Sherif) 發表了一項令人震驚的研究：在某次夏令會中，他們將一群十一、二歲小孩分成兩組，有些小孩子是好朋友，但他們被編排到不同的組別，很快這兩群小孩發展出對自己小組的認同和忠誠，沙聶夫婦安排他們參加一些運動比賽，起初他們還有點運動家的風度，但不久之後，兩組人互相表現出極端敵意的態度，本來是好朋友的小孩子，竟然反目成仇。²⁷ 這項研究顯示出：即使是最純真的孩子，也可以黨同伐異。

這先天心理傾向，未必會造成族群對立，後天的“社群化”(Socialization) 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一項在2002年進行的研究指出：在北愛爾蘭，三歲至六歲的小孩子已經清楚地區分什麼是象



徵天主教、基督教的東西，當他們稍為年長一點，就已經懂得害怕和排斥對方的人。在北愛爾蘭，只有百分之四學童在混合天主教、基督教的學校上課，難怪一項2001年在貝爾法斯特蒐集樣本的問卷調查顯示：大多數少年人、青年人都不會跟與自己不同信仰的人交談。²⁸

他們又指出：人類傾向於尋找“代罪羔羊”和“非黑即白”的簡單化答案。例如提倡“白人優越”的“亞里安國度”(Aryan Nations)，對黑人、西裔人、猶太人抱著偏見，當中猶太人更特別受到憎恨，很多猶太裔美國人是過去兩三代的移民，在很短時間內他們卻取得鉅大成就，本地白人不禁質疑為什麼猶太人能成功、自己卻不能，最令自己心安理得的答案是：猶太人以卑鄙手段發財。令人更加震驚的是：即使受過高深教育的人，也傾向於接納違背事實的簡單化答案。眾所週知，1990年代南斯拉夫陷入內戰，塞爾維亞挾著優勢兵力，對其他敵人施行“民族大清洗”，特別是阿爾巴尼亞人。李雲與拿賓露域舉出了一位名叫利高力(Slavica Nikolic)的塞爾維亞女教授，說明知識分子亦可以埋沒理性，利高力畢業於南斯拉夫某著名大學，後來留學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任職科學教授，並且在美國定居下來，巴爾幹半島戰爭爆發之際，起初利高力感到迷茫，其後利高力認定：塞爾維亞人是受害者，傳播媒介歪曲事實，將他們描繪為壓迫者。利高力割斷了跟其他南斯拉夫族裔朋友的聯繫，專心致志地宣傳“塞爾維亞是受害者”。²⁹

五 結語

筆者同意蔡美眉所說，世界的確在仇恨中燃燒，可是，蔡美眉的分析只局限在政治學、經濟學的層面，她將全球性的種族衝



突歸結為美式全球化之步伐過於急促，這個簡單化的答案間接地為全球競爭中的落後者提供了一個“代罪羔羊”，例如一九九七年亞洲發生金融風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斯指責美籍猶太人是幕後黑手，卻沒有檢討亞洲金融市場的結構問題。³⁰ 而且，將焦點集中在美國對外政策、反美情緒方面，令問題陷入意識形態、甚至流於情緒化的爭辯之中，例如右派認為蔡美眉是末落論者、悲觀主義者，左派認為她合理化新帝國主義，而反霸權主義者亦只會專注於書裏面美式民主失敗的個案。

筆者認為：李雲與拿賓露域對世界仇恨的分析，比起蔡美眉的說法，就更有實用價值和更有深度，一來，採用心理學的角度進行分析，就可以避免源於政治意識形態的情緒化爭論，二來，將問題局限於政治、經濟層面，是變相地強化了“他、我”的對立，彷彿萬惡之源就是某個國家某些政客，而且，這種分析予人一種無奈的感覺，一般人除了上街示威、在互聯網張貼文章之外，還可做什麼去影響政治政策、經濟制度呢？李雲與拿賓露域的心理分析，呼喚每個人都要承擔責任。上面提到，種族問題是美國學術界一個禁忌，每個人都不願意被貼上“種族主義”者的標籤，但事實上，可能每個人與生俱來都傾向相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還有，許多人可能有意無意之間，為種族主義的“社會化”推波助瀾，例如因著政治立場而醜化某種群、甚至散播誇大和未經証實的消息，例如在“九一一”之後，說“九一一”是猶太人的陰謀”的謠言，在互聯網不脛而走。李雲與拿賓露域的分析，提醒每個人都要檢討自己的排他傾向，都要小心自己怎樣被“社群化”，和自己怎樣使他人“社群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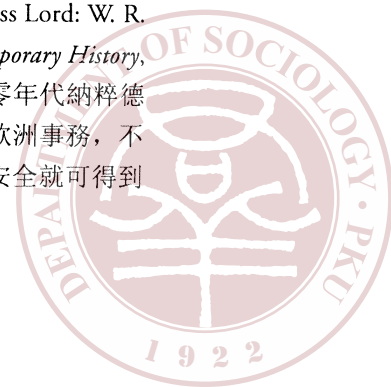
注釋

- 1 Amy Chua,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Doubleday, 2003).
- 2 蔡美眉所描述的民主制度缺陷，是多數人迫害少數人的“暴民政治”(Tyranny of majority)，Tom Ginsburg 和 Chong Ho Yu 對於蔡美眉這含糊的民主定義有深刻的批判，請參考Tom Ginsburg, “Democracy, Markets and Doomsaying: Is Ethnic Conflict Inevitable?”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2, (2004) 310–335; Chong Ho Yu, *Critique of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by Amy Chua* (2004). [database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hps/WorldonFire.pdf>.
- 3 Chua, 23–48.
- 4 Chua, 49–125.
- 5 Chua 211–228. Ginsburg 認為蔡美眉將以色列看為主導地區的少數民族、並且將以阿衝突放入此一架構中，是大有問題。沙特阿拉伯十分富有，埃及、約旦比較貧窮，但沙特阿拉伯對以色列的憎恨，比後兩者有過之而無不及，請參考Ginsburg, 321–322。
- 6 Chua, 229–258.
- 7 Chua, 259–288.
- 8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 9 Ginsburg, 311; 秦亞青：〈市場經濟、民主體制和種族仇視——讀《燃燒的世界》〉，《美國研究》第二期（2003，北京），頁1–4。
- 10 Thomas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0).
- 11 除了《燃燒的世界》之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格烈（Joseph Stiglitz）的作品，亦是批判全球化和市場經濟基要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的經典，參考Joseph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Horton, 2002)。
- 12 Joshua Muravchik, “The New Gloomsayers,” *Commentary*, 115, (2003): 24–29.
- 13 Greg Grandin, “What’s a Neoliberal to Do?” *Nation*, 276, (2003): 25–28.
- 14 無論如何，蔡美眉的論調對左派比較有利，反美國霸權主義者、反全球化者，都可以從蔡美眉身上尋找支持自己的言論；而相信“民主危害穩



定”論的學者，更以蔡美眉為知音。可是，這些支持“穩定至上”的論調，亦是基於濃厚的意識形態而缺乏事實根據，南斯拉夫在強人鐵托統治之下，各個族裔表面上保持和諧，強人統治結束之後，塞爾維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互相仇殺了幾近十年；在史太林時代，車臣動彈不得，蘇聯解體之後，車臣分離主義者成為俄羅斯人的最大困擾，強調一時的穩定而犧牲民主，長遠來說，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動盪。

- 15 Richard Herrnstein and Chales Murray,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 16 Linda Gottfredson, *The Bell Curve and Beyon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New York, 1996 April). 亞歷桑那州立大學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教育學院的孔恩 (Sandy Cohn) 教授，亦曾經向筆者表示面對過同樣壓力，大學當局不容許他披露不同種族在某些測驗成績中的差異。
- 17 Fox News, “Study: Wealth Gap Grows Between Races,” [database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foxnews.com/story/0,2933,135714,00.html> (accessed October 31, 2004).
- 18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有關 Ronald Dworkin 的評論，請參考 Chong Ho Yu, “Is Affirmative Action Compatible with Fairness?” [database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hps/affirmative.pdf>.
- 19 Dinesh D’Souza, *The End of Rac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 20 Jack Levin and Gordana Rabrenovic, *Why We Hate?* (New York: Prometheus, 2004).
- 21 一九九三年我有機會跟一位德國學生交談，她說在德國仇恨外國人並不是個別、孤立的事件，當極端主義者毆打外國人和焚燒他們的住所時，大量圍觀者不但沒有援手，反而拍手叫好。
- 22 M. L. Tudy, “Book Review: Worlodon Fire,” *CATO Journal*, 22 (2003): 569-572.
- 23 Warren G. Harding, *Inaugural Speech* (1921). [database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bartleby.com/124/pres46.html> (accessed June 21, 2004).
- 24 Rodney Carlisle, “The Foreign Policy Views of an Isolationist Press Lord: W. R. Hears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1936-4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9 (1974), 217-227. 赫氏自稱為“孤立主義”者，一九三零年代納粹德國興起，赫氏透過其傳媒影響力，極力主張美國不要參與歐洲事務，不要對希特拉作出任何挑釁行動，只要美國置身事外，自身安全就可得到



保障。他又說美國不應該鼓勵英國和法國跟德國敵對，英法希望重新製造第一次大戰的形勢，然後把美國捲入。一九三六年德國出兵萊恩區，赫氏為德國辯護：“德國所做的，無非是任何國家都會做的事情，就是收回屬於自己的土地。”一九三八年納粹併吞捷克，赫氏說蘇聯援助捷克共產黨，蘇聯當然希望美國支持捷克反抗德國，所以他站在英國首相張伯倫一邊，認為最好還是讓德國接收捷克，以換取和平。

- 25 Bob de Graaff, “Boget or Saviour? The Im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etherlands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 *Anti-Americanism in Europe*, ed. Rob Kroes and Maarten van Rossem (Amsterdam: Free University, 1986), 51–61.
- 26 Levin and Rabrenovic, 63–65.
- 27 Levin and Rabrenovic, 127–128.
- 28 Levin and Rabrenovic, 69.
- 29 Levin and Rabrenovic, 72–73.
- 30 Friedman, 112–113.

